

目录

总主编的话	i
序言	vii
前言	xi
第一章 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价值阐释	1
1.1 促进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	2
1.1.1 相关论断	3
1.1.2 机制分析	5
1.2 助推中国形象的海外建构	10
1.2.1 相关论断	11
1.2.2 机制分析	14
1.3 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18
1.3.1 相关论断	19
1.3.2 机制分析	22
1.4 本章小结	27
第二章 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历史与格局	30
2.1 中国儿童文学译介与传播的发展历程	30
2.1.1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奠基期	31
2.1.2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中国儿童文学外译 的起步期	36

2.1.3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发展期···	41
2.1.4	小结·····	48
2.2	中国儿童文学译介与传播的空间图景·····	49
2.2.1	中国儿童文学在英语国家的译介与传播·····	49
2.2.2	中国儿童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	64
2.2.3	中国儿童文学在德国的译介与传播·····	71
2.2.4	中国儿童文学在西班牙及拉丁美洲的译介与传播·····	76
2.2.5	中国儿童文学在阿拉伯国家的译介与传播·····	83
2.2.6	中国儿童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	88
2.2.7	小结·····	91
2.3	本章小结·····	93
第三章 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译本生成		95
3.1	风格再造·····	96
3.1.1	风格的概念、内涵和价值·····	97
3.1.2	儿童文学外译的风格再造思路·····	99
3.1.3	小结·····	110
3.2	文学性生成·····	111
3.2.1	儿童文学中的文学性的概念、内涵和价值·····	113
3.2.2	儿童文学外译的文学性再造路径·····	115
3.2.3	小结·····	131
3.3	乡土语言翻译·····	132
3.3.1	乡土语言的概念、内涵和价值·····	133
3.3.2	儿童文学外译的乡土语言翻译策略·····	134
3.3.3	小结·····	145
3.4	本章小结·····	146

第四章 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传播与接受 148

4.1 译文的变异与再生	149
4.1.1 选本介绍	150
4.1.2 译文变异的类型	152
4.1.3 译文变异的缘由	160
4.1.4 译文变异的概念整合机制	165
4.1.5 小结	167
4.2 传播的影响与受制	167
4.2.1 选本介绍	168
4.2.2 传播的影响与受制因素	171
4.2.3 扩大传播影响的策略与路径	180
4.2.4 小结	183
4.3 读者的接受与阐释	184
4.3.1 读者接受与阐释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185
4.3.2 读者阐释中的突出问题及缘由	188
4.3.3 小结	196
4.4 本章小结	197

第五章 个案分析 200

5.1 《神笔马良》外译研究	201
5.1.1 《神笔马良》的出版与译介	201
5.1.2 《神笔马良》的传播与接受	204
5.1.3 小结	211
5.2 《宝葫芦的秘密》外译研究	212
5.2.1 《宝葫芦的秘密》的文本特质	212
5.2.2 《宝葫芦的秘密》的译文生成	215
5.2.3 《宝葫芦的秘密》的传播与接受	222

5.2.4 小结	224
5.3 《黑焰》外译研究	224
5.3.1 《黑焰》的译本生成	226
5.3.2 《黑焰》的传播与接受	230
5.3.3 小结	231
5.4 本章小结	232
 第六章 结语	 234
 参考文献	 240

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价值阐释

儿童文学是成人作家以儿童为首要读者、专门为儿童所创作并为儿童读者所接受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既有民族性，“集中体现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基因、精神气质和未来想象”（徐德荣 2022：47），同时又具有世界性，被称为“最能沟通人类共同的文化理想与利益诉求的文学”（王泉根 2018）。儿童文学鲜明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使其成为传播民族文化的要道以及丰富世界文学图景的关键。纵观世界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安徒生童话》、《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等经典故事在众多国家间流传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已然成为代表其国家艺术创作水平和人文精神的“名片”。在样式丰富的文学领域，儿童文学可谓是最能感染人心、引起共鸣，并且容易进入世界集体文化记忆的体裁之一。

中国儿童文学连接着我国的历史文化根脉，蕴含着我国对人类普遍精神追求的独特理解。虽然从历史发展来看，我国的儿童文学创作晚于西方；然而，历经百年积淀，在各项教育战略的加持下，我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如今已是高速发展。百年间，我国涌现了张天翼、曹文轩、杨红樱、汤素兰、张之路、黄蓓佳、沈石溪、秦文君、高洪波、郑春华、彭懿、梅子涵、殷健灵、董宏猷、张秋生、薛涛、

任溶溶、葛翠琳、任大星、金波、冰波、孙幼军、蔡皋、朱成梁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作家，以及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聂峻、陈佳同、九儿等国际知名的年轻作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儿童文学现在已处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准上，可以说已经在国际水平线上了”（曹文轩、行超 2016）。无论是国际童书出版界、国际儿童文学研究界，还是普通大众读者，整体上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关注和兴趣较之前都有了大幅提升。推动更多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使不同国家的儿童更好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形成对中国的情感纽带，可谓正逢其时。黄友义曾说，“民心相通首先要从娃娃抓起”¹。诚哉斯言，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的旨归，即在于为各个民族的儿童提供精神滋养，促进民心相通。接下来，本书将聚焦价值定位这个“统领全局的问题”（许钧 2021：72），详细介绍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具体时代价值，望能借此构筑学界共识、凝聚学界力量，打造明确、有力的外译价值观，使中国儿童文学进入更多海外读者的视野，最终跻身于世界经典儿童文学之林。

1.1 促进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 2017）中华文化底蕴丰富、独具特色，是我们的立国之本、生存之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对中华文化抱有兴趣与热爱的海外人士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恐怖主义、地区冲突等风险仍为严峻的今日，中国文化内在的人生哲学与处世之道

1 此句系笔者徐德荣在与黄友义先生会谈过程中，黄友义先生所提出的观点。

更显价值与意义。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使不同国家的读者更深入、全面地体认中国文化，不仅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必要途径，亦符合人类和平发展的需要以及世界对中国的期待。

中国文化走出去，体现了我国主动融入世界的积极进取精神以及丰富全球文化、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使命担当。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作品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正如黄友义所说，“文学是了解一个国家文化最好的媒介，我们要让人家了解我们的文化，了解我们人民的生活情趣，应该靠文学”（鲍晓英 2013：64）。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儿童文学在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功用，理解这点，对于我们更好地开展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事业具有重要指导价值。我们将首先介绍相关研究与论断，呈现海内外学者对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与中国文化传播的观点；进而聚焦缘由，分析中国儿童文学在文化传播中的特殊效用及其具体机制。望以此加深学界对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之文化价值的了解，共同推动以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为媒介的中国文化传播事业。

1.1.1 相关论断

整体来看，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于中国文化传播之用，在国内已引起重视，并逐渐形成共识；在国外虽尚未出现直接的讨论，但关于广泛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与文化传播，已有权威性论述。接下来，本书将对国内外相关论断分别进行说明。

从国内现有研究来看，近几年出现了不少从意义建构方面阐释儿童文学外译的论述，特别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其进行价值定位。徐德荣（2022：48）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外译有诸多问题值得研究且需要被研究，已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版图中亟待关注的重大课题”。谭旭东（2017：36）认为，童书“走出去”不只是简单的版权

输出和商业行为，还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与战略意义，也是我国积极参与世界文化融合与竞争，展示自身文化实力的重要路径。张云（2020：22）认为，“儿童文学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是最容易‘走出去’的文化产品”。花萌（2024）指出，“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当下，儿童文学相较于成人文学更具优势，让其‘先行’实为良策”。卞月娥（2021：41）也提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蓬勃发展，儿童文学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中的重要一员”。可见，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外译对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在国内已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并得到了高度的认可。

相比之下，国外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与中国文化传播的研究尚不多见，但就广泛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翻译和文化传播而言，已有不少具有启发性的论述。举例说来，丽塔·奥伊蒂宁（Riitta Oittinen）在 *Translating for Children*（《为儿童而译》）一书中将儿童文学视为儿童文化的载体，并将儿童文学翻译看作传播儿童文化乃至整体社会文化的途径。她认为“儿童文化始终是社会整体的映照，体现了成人对童年的想象、儿童体验童年的方式，以及成人记忆童年的方式”（Oittinen 2000：41）。吉莲·拉西（Gillian Lathey）在其标志性专著 *Translating Children's Literature*（《儿童文学翻译》）一书中也提出，儿童文学是一种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发展意义的动态媒介，其翻译因此既富挑战性，又充满启发性（Lathey 2016：141）。哲学家、史学家保罗·阿扎尔（Paul Hazard）更是将儿童文学比作一个国家的外交使臣，认为儿童文学具有展示文化核心力量的深层价值，在他看来，“儿童文学塑造民族之魂，并维系其特质”（O'Sullivan 2005：6）。总而言之，儿童文学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儿童文学翻译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这一观点在国际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已成为共识。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不仅是文化的承载者和表现者，更是一种

高效的文化传播媒介。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事业，儿童文学外译责无旁贷。然而，尽管学界已注意到中国儿童文学外译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但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分析儿童文学在文化传播中的具体运行机制，希望以此加深读者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促进相关研究和实践的发展。

1.1.2 机制分析

儿童文学翻译之所以在文化塑造、传承、传播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与儿童文学自身在形成过程、表现形式、受众群体三方面的特征密切相关。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中国儿童文学外译对于促进中国文化传播的独特价值。

第一，从形成过程来看，儿童文学发源于民间文学这一民族文化根脉，因而具有浓厚的文化基因。所谓民间文学，即“一个民族世代传承的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过广大人民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并不断进行集体修改、加工的文学”（杨金戈 2022：131）。可以说，“几乎所有国家、民族的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改编民间文学这一起点”（朱自强 2009：58）。中国有大量民间文学，其内容朴素真实，蕴藏着深厚文化传统。这些民间文学不仅是中国儿童文学得以诞生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取之不尽的思想和灵感源泉。《咕咚来了》《神笔马良》《小马过河》《金色的海螺》等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无不与民间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中国儿童文学自诞生之初，便与中国最原初、朴素的民族文化紧密相连。此外，儿童文学不仅从民间文化中汲取养料，展现出显著的文化遗产的功能，还深刻反映所属时代的文化特点，具有强大的文化建构价值。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来看，儿童文学始终根植于社会背景，甚至呈现出文化塑

造的先锋作用。五四时期，我国启蒙思想者借助儿童文学塑造新文化，宣扬新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知识分子通过儿童文学传播红色文化，凝聚国家精神；改革开放后，我国建设者通过儿童文学宣传多元文化，活跃社会氛围；当下，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在汲取民间优秀文化、承继先前创作者之文化情怀的同时，将我国新时期的现代文化思想融入创作之中，以兼济文化传承与创新之理念建设文化中国。可以说，我国相对稳定的文化基因、不同时期的文化风貌，以及未来的文化理想，皆蕴藏于看似浅易的儿童文学之中。中国儿童文学通过外译这一渠道，能够向世界传递立体、多元的中国文化面貌。由此观之，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事业中，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价值重大、不可轻视。

第二，从表现形式来看，儿童文学以鲜明的故事性为主要特征，被誉为“故事文学”。故事易于记忆、便于口耳相传，是文化的承载体，于是文化在故事讲述中被赋予活跃的生命力，具备在时间上不断延续、在空间上持续拓展的潜能。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主要依赖故事的讲述，这一观点已得到广泛认可。梅尔文·康纳（Melvin Konner）认为，如果人类不能彼此交流并将故事传递给下一代，集体记忆与文化便难以形成；正因如此，讲述故事不仅是所有人类文化都具备的能力和正在进行的实践，也可能是文化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Zipers 2012: 1）。美国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也认为，“我们用逻辑和抽象的规则来认识物理的世界，用故事来认识人文的世界，而体现人类智慧的这两种文化不只是应该相互补充、相互协助，其中故事（叙事）的智慧还是整个智慧的芽苞或种子”（朱自强 2009: 31）。此外，阿瑟·弗兰克（Arthur Frank）提出，故事能够深入影响人的思想观念，它“与人共鸣，为人服务，且总是对人产生影响，左右人们认为什么是真实的、可能

的、有价值的或应尽量避免的”(Zipes 2012: 1)。上述观点表明,故事是人类认识和思考世界的主要方式,是建构、记忆和传承文化的关键载体。正因如此,传播中国文化的关键在于讲好中国故事。

故事性可被视为所有文学作品的普遍性特征,但相较于成人文学,故事性在儿童文学中显得更加必要且不可或缺。正如朱自强(2009: 31)所言,儿童文学作家如果舍弃故事,“其创作一定是寸步难行”;“纵观儿童文学的历史,不写故事却获得成功的作家闻所未闻”。故事是儿童文学的灵魂与根基,没有故事,儿童文学便难以打动儿童读者,从而失去其应有的魅力和影响力。毕竟,儿童作为儿童文学的主要目标群体,其思维本身就具有天然的故事性,他们的思考大多是通过故事进行的(同上: 30)。儿童文学对故事性的要求使其成为文化传播的强大载体。约翰·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和罗宾·麦卡勒姆(Robyn McCallum)在 *Retelling Stories, Framing Culture: Traditional Story and Metanarrative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故事的重述与文化的构建: 儿童文学中的传统故事与元叙事》)一书中明确指出,“故事的重述过程不仅深度介入文化的建构,也持续激活我们用以理解文化的认知框架,并使其不断循环与再生产”(Stephens & McCallum 1998: xi)。纵观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无一不重视故事性。曹文轩提出,“故事是人类存在状态的模型,是人类存在的写照”(曹文轩、冯圆芳 2023)。黑鹤也坦言,“我从来不试图进入孩子的世界,我让他们进入我为他们构建的世界”(黑鹤、陶化玺 2019)。秦文君同样强调故事的重要性,认为“儿童之间的‘相传’比其他手段更有力量”(舒晋瑜 2020)。阅读中国众多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可以直观感受到文化与故事的浑然天成——文化寓于故事,故事承载文化。总而言之,文化的表达依赖于故事的讲述,而在所有文学体裁中,儿童文学无疑是最能彰显故事性的文类之一。

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离不开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在场。

第三，从受众群体来看，儿童文学具有鲜明的双重读者属性，能够扩大文化的影响范围并引发大众效应。佐哈尔·沙维特（Zohar Shavit）曾指出，“儿童文学作家或许是唯一被要求既为某一特定受众群体写作，同时还要吸引另一受众群体的人”（Shavit 1986: 37）。这种双重读者属性赋予了儿童文学双重的文化影响力，使其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独特而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对于儿童而言，儿童文学能够塑造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引导其了解特定文化、拓宽文化视野，并培养积极的文化行动力。正如蒂莫西·拉辛斯基（Timothy Rasinski）和南希·帕达克（Nancy Padak）所说，儿童文学“不仅能帮助儿童理解多元文化，建立相关价值体系，还能赋予其思想动力，使其积极采取行动，践行这些认识和价值观”（Rasinski & Padak 1990: 580）。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中国儿童文学外译可以使海外儿童形成对中国文化的积极认知与情感向往，从而为他们未来的行为选择奠定思想与情感基础。例如，笔者之一的外籍同事杰里德·米勒克尔（Jared Miracle）曾坦言，他之所以选择来中国任教，主要是因为小时候阅读了儿童版的《西游记》，由此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热爱，并立下有朝一日到访中国的决心。另一方面，儿童文学在成人中同样拥有广泛的读者基础，包括儿童文学的创作者、出版者、评论者以及教师等服务于儿童群体的“被动”读者，还有欣赏儿童文学艺术品质、在其中寻求精神乐趣的“主动”读者。对于成人读者而言，儿童文学能够滋养、修正，甚至重塑他们的文化观念与价值体系，阅读儿童文学因而成为一种反思与自我发现的契机。正如刘江、张生珍（2023）所言，儿童文学可以引导成人踏上一段学习和自我发现的旅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中，通过中国儿童文学的外译，

我们不仅能够为海外成人读者提供感性层面的精神滋养，还能向他们展示中国对下一代的教育理念，从而引导他们在理性层面对中国文化形成更为具象的认识。这是因为，尽管儿童文学的主要目标群体是年轻一代，但其创作始终受到特定文化影响下成人教育理念的制约。正如佩里·诺德曼（Perry Nodelman）所言，儿童文学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成人价值观念主导，“它既给儿童提供了成人认为儿童喜欢的东西，也提供了成人希望他们需要的东西，但它这样做总是为了满足成人对于儿童的需求”（诺德曼 2014：253-254）。这种对儿童的认知、需求以及期待实际上就是特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通过阅读中国儿童文学作品，海外成人读者可以直观感受到中国的教育理念与方式，理解中国文化影响下中国人民的精神特质及未来愿景。要之，相较于成人文学，儿童文学拥有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体，能够在不同层面对儿童和成人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事业需要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参与。

总之，中国儿童文学的外译之所以能够助力中国文化的传播，得益于其深厚的文化根基、独特的叙事形式和广泛的受众群体。具体而言，中国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化紧密结合，能够传递出我们民族最朴素、最纯真的文化内核；在文体特征上以故事为叙事框架，能够为文化表达提供灵动而鲜活的表现形式，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而面向儿童和成人双重读者的属性，则使中国儿童文学显著扩大了文化传播的范围，具备引发大众效应的潜力。从当前的翻译实践来看，借助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中国文化传播已经初见成效。例如，美国权威评论性杂志 *Booklist*（《书单》）曾如此评价《青铜葵花》：“该书展现了重要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包括敬爱父母、尊敬长辈、崇尚勤奋、注重教育以及珍视自尊。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感人故事，它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应

心怀感恩，珍惜家庭与爱。”(Forrester 2017)由此可见，以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为载体进行中国文化的域外传播，不仅具有充分的理论合理性，还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需要凝聚力量，持续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1.2 助推中国形象的海外建构

国家形象关乎一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所谓国家形象，是指“人们（形象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对一个国家（形象客体）由其客观存在所决定的外在表现的总体印象和评价”（吴献举、张昆 2016：59）。国家形象建构是一个重要而又充满挑战的问题，因为形象客体的“印象和评价”并非总是呼应形象主体的“客观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形象客体国家要加强与形象主体的沟通和交流，增加形象主体对该国的了解，使其改变对该国的认识和评价”（同上：61）。西方国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一直欠缺准确性和客观性，这阻碍了中西方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平等交流。因此，我们亟须积极主动地参与对话，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国家形象的展示和建构需要媒介与载体的支撑。在这一方面，文学作品无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约瑟夫·莱尔森（Joseph Leerssen）指出，“民族刻板印象在想象性和诗意文学领域的形成、延续和传播开始得最早，且最为有效”（Leerssen 2007：26）。的确，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对于国家形象塑造的影响往往是深刻且持久的。当下，中国形象在海外频频遭受挑战，“文学作为中国形象建构和传播矩阵承载着中国形象文学塑造的历史责任”（宋庆伟

2024: 159)。莫言曾说,“世界需要通过文学观察中国,中国也需要通过文学来展示自己的真实形象”(刘莎莎 2012)。这一观点无疑切中要害,文学作品的国际传播是当下塑造中国形象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文学中,儿童文学作为一个重要且独特的门类,在国家形象建构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学界对此一直缺乏充分的认识与足够的重视。如果忽视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中国形象的海外建构势必会缺少必要的一环。接下来,我们将结合相关学者的论断,从国家形象建构的角度,探讨儿童文学外译的独特价值,并进一步阐明儿童文学翻译如何助力国家形象的构建,以期加深学界对中国儿童文学外译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的认识,推动以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为媒介的国家形象建构事业的发展。

1.2.1 相关论断

整体来看,国内已有一定研究探讨了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与中国形象建构之间的关系;尽管在国外尚未发现针对这一主题的专门研究,但关于广义上的儿童文学翻译与国家形象之间关联的讨论已相对丰富。

一方面,从国内视角来看,儿童文学翻译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早在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浪潮中就已被关注。以鲁迅为例,他在五四时期翻译了大量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并多次在副文本中发表有关国家形象的见解。例如,在翻译俄国童话时,鲁迅(2013: 294, 346)曾指出这些作品反映了“那边的伟大的精神”,也展现出“老俄国人的生态和病情”。可见,在鲁迅看来,儿童文学具有反映国家形象的独特功能。鲁迅试图通过儿童文学的翻译,使国人认识世界、改造思想。实际上,鲁迅的翻译并非孤例。五四时期,周作人、赵景深、郭沫若、郑振铎、胡适等众多知识分子也积极参与儿童文

学翻译，构成了中国翻译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翻译本身不是目的，它是灵感的源泉，刺激人们不断思索并成为进行下一步研究的起点。”（德利尔、伍兹沃斯 2018：137）在风雨飘摇、国家危难的年代，鲁迅等人通过引介外国儿童文学，使国民得以认识他国形象；而在当今时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我们更需要通过中国儿童文学的外译，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这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演进的必然。从国内现有研究来看，学界已经开始注意到儿童文学外译在中国形象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例如，荣智慧（2012）认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输出对世界重新看待中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有着重要且无法取代的意义”。还有学者发现，“由于部分国家对中国既有的刻板印象，长久以来对中国儿童文学作品进行译介和阅读时形成了定式，部分国家特别青睐体现中国贫穷落后的儿童文学作品，并在相关作品阅读的基础上加深既有的刻板印象”（徐德荣 2022：54）。由此可见，中国儿童文学是国外读者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而通过儿童文学外译，我们可以主动参与对中国形象的重塑，修正既有偏见，促进相互理解与平等交流。

另一方面，从国外视角来看，关于儿童文学翻译对国家形象的影响，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现择其要者而言之。艾莫·奥沙利文（Emer O'Sullivan）在“Imagology Meets Children's Literature”（《形象学与儿童文学相遇》）一文中提出，“儿童文学为年轻读者呈现出他们逐渐接触的世界的初始图景，并赋予他们理解这一世界所需的语言资源”（O'Sullivan 2011：7）。她还指出，对某些民族的刻板印象影响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与阅读，而儿童文学通过特定形象的刻画则可以进一步强化已有刻板印象。儿童文学与民族刻板印象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在儿童文学翻译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玛蒂娜·塞弗特（Martina Seifert）曾发表“The Image Trap: The

Translation of English-Canadian Children's Literature into German”（《形象的陷阱：加拿大英语儿童文学的德译研究》）一文，发现加拿大儿童文学经典《绿山墙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之所以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被引进德国，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加拿大在德语文化中一直都是由男性群体主导的荒野形象，而《绿山墙的安妮》中女性化的小镇世界则完全不符合德国出版商引进加拿大儿童文学时的预期（Seifert 2005）。再如，海伦·弗兰克（Helen Frank）曾撰 *Cultural Encounters in Translated Children's Literature*（《翻译儿童文学中的文化相遇》）一书，详细考察了澳大利亚儿童文学法译本中国家形象的呈现。她发现，在法译文本中，澳大利亚通常被置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下，呈现出一种落后、异域、荒芜、野性、未知的“他者”形象，而其现代化的城市文明与多元交织的土著文化形象则被显著弱化。从文本选择到译本的包装设计、语言文体风格、说教方式以及互文性参照等多个方面，法译的澳大利亚儿童文学经历了系统性的操控，从而屏蔽了一个真实、独立、城市化且兼具现代异域风情的澳大利亚形象（Frank 2007）。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在由相对强势的目标语国家主导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中，原文本的选择往往受民族刻板印象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局限性。此外，原文本中的国家形象常常被改写和操控，以迎合并强化既有的民族刻板印象。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翻译对国家形象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当下，一些西方国家受刻板印象影响，倾向于译介讲述中国贫苦时代的作品，这不仅阻碍了海外儿童对中国形象的正确认知，更会对日后的跨国交流与合作埋下隐患。通过主动向海外读者提供多样化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有效调整甚至消解海外童书市场中中国儿童文学主题上的单一，使海外儿童有机会接触到更丰富的中

国故事，了解一个鲜活、真实且全面的中国，从而为未来更深层次的跨国交流与合作奠定意识形态基础。

1.2.2 机制分析

儿童文学翻译之所以对国家形象建构具有强大功用，不仅是因为儿童作为认知经验有限的群体，在阅读中能够建立起对一个国家的最初印象，更是因为国家形象建构的诸多条件，包括建构理念、建构内容、建构形式等，都与儿童文学的特征高度吻合。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三方面逐一论述，进一步加深读者对儿童文学翻译于国家形象建构之用的理解。

第一，从建构理念来说，国家形象建构必须有意识形态的参与，因为“国家形象的构建是一个由意识形态所主导，并始终围绕着国家核心利益服务而展开的过程”（刘鑫森 2014：1）。所谓意识形态，指“某一阶级、政党、职业内的人（通常是知识分子）对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它是某一国家或集体里流行的信念，潜藏在其政治行为或思想风格中；哲学、政治、艺术、审美、宗教、伦理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蒋骁华 2003：24）。儿童文学作为塑造民族未来之公民的文学形式，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属性，能够集中反映该民族“对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以及“流行的信念”。正如奥沙利文（O’Sullivan 2011：7）所说，“儿童文学蕴藏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传承民族信息、信仰、习俗的平台，它或隐或显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的主流社会和文化规范”。因此，传播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实际上是传播中国特定时期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例如，从当下全球发展来看，生态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我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教育，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与此同时，中国生

态儿童文学迅速崛起，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文学类型之一。将这些作品译介到海外，无疑有助于丰富西方读者对中国形象，特别是生态中国形象的认知。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当前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整体接受效果与其理想预期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但若因此否定其可行性则不尽合理。实际上，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中国儿童文学外译存在之本身，就能对良好国家形象的建构起到积极作用。这是因为，不同于大多数古已有之的文学类型，儿童文学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与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朱自强 2000：6）。儿童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在中国古代，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限制，严格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并不存在。直至五四时期，在叶圣陶、冰心、沈从文等作家的推动下，中国儿童文学才真正诞生。如今，中国儿童文学已呈现出“繁花似锦”的景象，“迎来世纪满园春”（王泉根 2019），这是重要的历史转变，反映了我国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提升。因此，本书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外译具有必要性，因为中国儿童文学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且代表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成果，能够为国家形象建构贡献积极力量。

第二，从建构内容来说，儿童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形象的海外建构离不开对儿童形象的描绘。胡适（2021：244）曾说，“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其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而要把握某一社会对儿童的态度，儿童文学可谓是主要途径。一方面，儿童文学与一个社会如何看待童年以及如何定位儿童息息相关。一个国家只有重视儿童的地位、保护儿童的权利、尊重儿童的兴趣，儿童文学才能蓬勃发展。从这一层面来说，推动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可以使目标语国家认识到中国社会对儿童的重视，理解儿童

的乐趣和成长在中国现代教育理念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从而展现出一个重视儿童、重视教育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无论是采用文字、图像，还是图文结合的形式，儿童文学通常以儿童为主要叙事对象。因此，通过外译不同形式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更加生动、细腻地展现中国儿童的外在形象和内在精神，使海外读者对整体的中国形象有更为全面的认识。比如说，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曾致力于输出刻画“小英雄”形象的红色儿童文学作品，产生了良好的接受效果，对国际社会更全面、真实地了解中国的抗战经历，更深刻地把握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建构红色中国形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是说，17年间红色中国形象的塑造，以红色儿童文学外译中的小英雄形象为重要支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儿童文学外译对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作用。除了作为国家形象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儿童形象外，意象也是国家形象建构中不可忽视的要素。所谓意象，即“主体通过将自我意志投射到客观物象的编码过程所编制而成的、内含着主体认知图式与情感记忆的符码，有着深刻的传播学色彩”（谢清果、韦俊全 2024：46）。中国在意象方面拥有深厚的历史传统，意象“已然成为中国文明在千年演进与传播实践中不可或缺的资源”，意象的传播成为“国家传播自我声音与形象的着力点”（同上：45）。在众多文学门类中，儿童文学由于目标读者独特的心理发展特点和审美倾向，对意象的刻画尤为突出。山、水、花、月、夜等带有浓郁中国文化色彩的意象，常常以灵动、可爱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这些意象的海外输出，对于展现中国的国家形象具有重要的作用。总之，中国儿童文学作品通过对儿童形象的关注和意象的塑造，与国家形象建构的内容高度契合，可以作为中国形象海外建构的重要抓手。

第三，从建构形式上来说，国家形象建构与形象元素的图画呈

现息息相关，因为对于很多事物而言，“观看”比“阅读”更有效（哈斯克爾 2018：4）。儿童文学作为一种高度重视图画表现的文学体裁，具有典型的多模态特征，特别是在儿童图画书这一体裁中，多模态特征尤为明显。“儿童图画书作品中的国家形象以文本和图像的形式呈现，能够通过文化符号的传播模式，潜移默化地在儿童心中完成国家形象的建构。”（王壮、刘晓晔 2021：29）从中国对外交流史来看，以图画为主的儿童读物不仅是国家形象“自塑”的重要媒介，亦是形象“他塑”的重要载体。在国家形象“他塑”方面，晚清时期的传教士为了向其所属国介绍中国形象，传播与中国相关的知识，出版了带有大量中国图像的儿童读物。例如，在海外产生广泛影响的 *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孺子歌图》），正是以图画形式传播中国形象的典型代表。在国家形象“自塑”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的 17 年间，我国为扩大对外交流、展现良好民族形象，曾开展以连环画为主要体裁的儿童文学外译。近些年，图画书在国际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已经“成为版权贸易中最抢手的品种之一，世界各大书展也成为各大出版商哄抢版权的主要‘战场’”（高静 2024：14）。我国的图画书创作发展迅速，在国际图画书市场的参与度不断提高。作品如《团圆》《鄂温克的驼鹿》《我是花木兰》《羽毛》等，先后在海外斩获国际奖项，成为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此外，除了传统意义上图文结合的图画书，我国儿童文学作家还创作了一些如 *The Only Child*（《独生小孩》）¹ 这样备受国际读者关注的无字图画书。这类绘本能够超越语言的限制，减少传播障碍，使海外读者在持久专注与深度体味图画的过程中捕捉书中所呈现的中国形象。总之，儿童文学，尤其是图画书这一体裁，凭借其典型

1 该作品由中国作家以英文创作在海外出版，后引入国内。

的多模态属性，能够将国家形象表现得更为鲜活、生动。在建构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方面，中国儿童文学外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借助儿童文学翻译进行国家形象建构，不仅合理有效，从某些方面来说更是十分必要的。大量研究与讨论表明，儿童文学翻译与国家形象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它既受到国家形象的牵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建构与重塑国家形象的作用。意识形态属性为儿童文学翻译参与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儿童形象和意象叙事使儿童文学翻译成为国家形象建构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多模态特征则进一步提升了儿童文学翻译在国家形象传播中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因此，中国形象的海外建构，离不开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参与。通过儿童文学的翻译与传播，我们能够以更鲜活、多元的方式向世界展现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1.3 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着中国智慧、中国情怀与中国视野，具有强大的时代引领价值和精神塑造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高祖贵 2023）人类命运共同体自 2013 年正式提出以来，“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和持续研究，愈益为实践所验证，愈益深入人心，彰显出强大的影响力、生命力、感召力，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同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

人民的心之所向，是未来对我们的召唤。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翻译的使命与作用愈加凸显。翻译作为“不同语言之间沟通的桥梁，具有促进民族团结、促进知识交流、促进社会进步和促进文化自觉的功能”（王东风 2023：44）。儿童文学翻译作为翻译活动中隐秘却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指我们共通的人性与全人类共同的关注点——儿童。“无论如何，人类的希望都在儿童这里。”（朱自强 2009：27）“无论是哪一种人种，也无论是哪一个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民族，就人性而言都是一样的”，对文学而言，“它的根本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曹文轩、邵燕君 2021）。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终极价值，正是通过巩固人类共有的人性基础，连接人类共通的精神追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接下来，本节将探讨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联及内在缘由，以深化学界对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价值的认识，为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贡献智慧和力量。

1.3.1 相关论断

整体而言，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外译在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国内近年来已有学者关注并开展研究；国外虽尚未有直接针对这一主题的论述，但关于儿童文学跨国交流能够促进民族融合、加强各国儿童的相互联系与理解的观点，已有许多权威性论述。

一方面，从国内来看，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阐释和实践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和启发力量。2023年，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外国儿童文学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年会召开，主题是“学科交叉、融合、创新视域下的中外儿童文学交流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这可被视为以儿童文

学外译为载体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典型事件。另外，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前主席张明舟在抗疫期间曾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初衷，积极推动中外童书的翻译事业，在国内外产生了热烈反响。他认为，“全球抗疫童书互译共读，其实也是希望各国的孩子能够看到彼此在读什么、想什么，通过行动互帮互助。未来这些孩子会更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者和捍卫者”（陈雪、王欢 2020）。儿童文学作家童喜喜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一个儿童，一定会很简单、很清晰、很准确地理解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曾瑞鑫 2018）。儿童文学研究者谭旭东（2022）也提出，“儿童文学的主要接受对象是儿童，因此具有跨文化、跨种族、跨性别的优势，在培养人类共同认识方面具有自然的优势，而且儿童是全世界、全人类都关注的对象，也是世界与人类的未来”。总之，儿童文学蕴含着人类共通的人性和共同的精神追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自然契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我国出版和翻译中国儿童文学的内在使命与最终目标。

另一方面，从国外来看，虽尚未有研究直接讨论中国儿童文学外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但关于儿童文学跨越民族文化隔阂、传递信仰与希望、促进相互理解与依存的理念，国际学界已经形成了共识。例如，阿扎尔（2014：182）提出了“世界儿童共和国”的概念，并用诗意的语言描述道：

儿童们的书籍维系着人们对祖国民族的情感，但它们也同时给予了孩子属于人类的情感。它们满怀爱描绘故土，但它们也同时讲述着生活在远方的我们的兄弟。它们虽然纯粹地表现了每一个民族独一无二的特点，但它们同时又是一个个使者，越过山川与河流，跨过浩瀚的大海，来到世界的另一头寻找友

谊。每一个国度在给予的同时也在收获着。在无数的交换中，在人生最初的印象里，诞生了一个世界性的儿童共和国。

“世界儿童共和国”的概念揭示了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在承认不同国家儿童文学具有民族特色基础上的、超越政治和语言界限的设想”（蒲海丰 2020：211）。尽管这一设想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却为许多人带来了希望与信念。比如说，伯莎·马奥尼（Bertha Mahony）在为阿扎尔写的序言中提到：“如今看来，人类对于建立一个世界民族共同体的渴望——一个致力于消除周期性大规模毁灭，并推动人类兄弟情谊得以实现的全球性组织——很可能在未来迎来第二次尝试。保罗·阿扎尔以几乎无可比拟的语言提醒我们：儿童的世界共和国早已存在。”（Mahony 1944：vii）虽然马奥尼将阿扎尔的童年共和国理想进行了现实化，但却反映出儿童及儿童文学在整个人类生存中的独特意义，以及儿童文学的世界流通在凝聚人类精神、维系情感联结、促进跨文化理解中的关键作用。当下，政治冲突、经济博弈与网络煽动日趋频繁，人类精神面临异化的危险，儿童文学的翻译与跨国流通不仅有助于强化人类共有的情感质地与精神诉求，也有望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情感认同，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注入文化支撑与情感基础。

总之，儿童文学翻译作为连接不同民族儿童、奠定人类人性基础的重要媒介，在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建立情感纽带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文化大国，中国主动将原创儿童文学介绍给海外读者，体现了积极与他国建立联系的开放心态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那么，中国儿童文学的域外传播通过何种机制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接下来，我们将对此进行简要探讨。

1.3.2 机制分析

整体来看，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之所以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主要是通过弘扬赤子之心、缔结情感纽带、铺设未来图景三方面来实现。

第一，儿童文学的译介与传播有助于唤醒人类的赤子之心。赤子之心既是孩童的纯真心灵，也是成人追求的一种人格境界与精神状态，其特点是真诚无伪、纯真自然。赤子之心在儿童身上得到最鲜明的体现，他们的纯真品质对人类精神成长具有巨大启迪作用。正如阿扎尔（2014：146）所言：“他们的任务正是带给世界新的信仰和希望。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些新鲜自信的年轻力量在循环补给着，人类的思想意识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他们是我们的继承者，是开始重新装点大地，令它变得青葱，令生命重新拥有了活着的意义的孩子们。”可以说，儿童之所以被视为人类的希望，不仅是因为他们处于生命进程的早期，拥有更多的发展时间和空间，更是因为他们富有赤子之心这一重要精神品质，能够发挥陶冶人类心性、唤醒人类精神的建构力量。拉西（Lathey 2016：8）指出，为儿童而译的最大挑战，同时也是最鼓舞人心之处，在于其蕴含的创造性潜能。这种潜能，正是“赤子之心”的展现——一种蕴含着变革与创新，能够启迪心智、凝聚精神、改造社会的力量。实际上，在我国遭遇危机的关键时刻，我国革命思想者正是通过儿童文学翻译来弘扬赤子之心，振奋民族精神，践行立人以立国的使命。例如，赵元任在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¹时，即将孟子所言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²置于首页献辞；周作人（2012：140）在推介《阿丽

1 今译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2 语出《孟子·离娄下》。

《思漫游奇境记》时也呼应道，“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都亲自做过小孩子，却早失了‘赤子之心’……这是很不幸的”；鲁迅（2013：288）翻译爱罗先珂（Vasili Eroshenko）童话时也表示“深感谢人类中有这样的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与著作”。可见，儿童文学的翻译具有跨越民族文化界限、鼓舞人类精神、激发情感共鸣的普遍价值。尽管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差异显著，但童年时期的赤子之心却构成了人类精神的共同底色。当下，人类对精神世界的关注日益加深，向世界介绍中国儿童文学，不仅有助于推动儿童文学的跨国交流，还能进一步凸显赤子之心的时代价值，弘扬人类的本真精神，构筑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第二，儿童文学的译介和传播能够使一国儿童建立与其他国度的情感纽带，促进民心相通。不同民族之间在情感上的相互需要与依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重建人类的情感世界。正如杨岚（2002：16）所言，“情感世界是人类精神的源头，是人文理性的始基，是健全人性之乡，在技术理性肆虐时期悄然萎缩的情感世界中孕育着人类文明的新希望”。儿童相较于成人，拥有更为细腻、丰富与本真的情感，而儿童文学正是滋养儿童情感、丰富其内心世界的重要媒介。阿扎尔（2014：6）站在儿童的角度向成人呼吁，“给我们书籍吧”，“给予我们飞翔的翅膀。既然你们是如此强壮有力，请帮助我们一起逃离到那个遥远的国度去吧”。童心无国界，儿童对外部世界怀有天然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其所思所想常常跨越地域与文化的限制，延伸至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宇宙。儿童对异域的向往与理解，离不开儿童文学的支撑。不仅如此，儿童文学带给儿童的情感体验往往深刻且持久，有时甚至会对他们日后的政治立场产生决定性影响。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凯瑟琳·帕特森（Katherine Paterson）的经历便

是明证。帕特森在1998年国际安徒生奖(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的获奖致辞中回忆道:

书籍可以为我们带来友谊,这种友谊是受制于时间和空间、过于有限的个体生活所无法提供的。

大约在11岁的时候,我读过一本叫《奋斗是我们的兄弟》的书。这本书讲述了斯大林格勒的儿童面对纳粹入侵时的故事。在阅读过程中,我感同身受,仿佛成了这些孩子们奋斗中的伙伴。几年后,有人告诉我必须憎恨并畏惧苏联,但我无法做到。因为《奋斗是我们的兄弟》这本书为我带来了来自苏联的朋友——那些我关心并无法忍受他们受到伤害的朋友。

.....

我曾浏览美国图书馆的数列书架,强烈意识到我们出版了如此之多的本土儿童读物,以致于常常察觉不到对其他国家儿童书籍的需求。我认为,我们必须¹给予孩子们来自伊朗、韩国、南非、塞尔维亚、哥伦比亚、智利、伊拉克,乃至世界各国的朋友。因为,当你在另一个国家拥有朋友,你就不可能希望那个国家遭受伤害。²

如果每个国家的儿童都能阅读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儿童文学作品,并如帕特森一样在其中投入情感、建立友情,那么各民族间相互依存的理想将指日可待。然而,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儿童文学的跨国流通存在显著不平衡现象。西方发达国家的儿童文学长期占据

1 译文中“必须”一词的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对应英文斜体 *must*。

2 全文见1998年IBBY第26届大会会议手册第19-23页。
网址: <http://www.literature.at/viewer.alo?objid=14834&viewmode=fullscreen&scale=3.33&rotate=&page=29> (2025年4月2日读取)。

主导地位，而东方国家，包括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则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积极推动中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走向海外，不仅有助于引导海外儿童与中国建立友情，也能弥补甚至打破当前国际儿童文学传播格局中的不均衡状态，促进各国儿童文学之间更广泛、深入且平等的交流。通过阅读广泛、多元的儿童文学作品，儿童能够在不同国家中找到心灵上的朋友，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坚实的情感基础。

第三，儿童文学的译介与传播有助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铺设人类共同的未来图景。在前两部分中，我们讨论了儿童文学翻译在唤醒人类赤子之心与缔结情感纽带方面的作用，凸显了其在人类精神领域的价值。然而，儿童文学翻译的意义绝不仅限于精神层面，儿童文学也不仅仅是儿童的“伊甸园”或成人逃避现实的“避难所”。作为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儿童文学始终积极回应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展现出问题导向与重塑现实的力量。比如，新冠疫情期间，抗疫题材童书应运而生，中国相关作品也被译介至海外。其中，《爷爷的14个游戏》(*Grandpa's 14 Games*)和《“躲”起来的妈妈》(*Mom Is Hiding*)获得 *Kirkus Reviews* (《柯克斯评论》) 推荐，受到国际关注。这些作品体现了儿童文学在全球性危机时刻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切回应，彰显出其团结人心、凝聚共识的独特文化价值。金伯利·雷诺兹 (Kimberley Reynolds) 在 *Radical Children's Literature: Future Visions and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s in Juvenile Fiction* (《激进的儿童文学：少年小说的未来展望和审美转变》) 一书中指出，儿童文学对社会变革作出积极回应，“鼓励年轻读者以乐观的态度思考未来，并认识到自己在推动社会整体进步中所能发挥的先锋作用” (Reynolds 2007: 16)。儿童文学既面向未来，又立足当下，儿童在其中不仅能遨游于幻想与未来的世界，也能收

获改变现实的勇气，明确前行的方向。也就是说，精神性与现实性是儿童文学不可分割的两面。

然而，从整体来看，中西方儿童文学在精神性和现实性上存在不同的侧重。西方儿童文学更侧重对儿童精神的张扬，注重“审美个性的自由发挥”，内容往往“富于幻想、感情奔放、异彩纷呈”；中国儿童文学则更偏重对现实的体悟，“表现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情感、避免流入神秘主义和纵欲的宣泄，强调想象的现实基础和符合‘逻辑’规范，因此造就了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品端庄平实、温柔敦厚的美学风貌”（汤锐 1990：46）。尽管两者在精神性与现实性上各有侧重，但最终的指向却是相同的——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景。也就是说，中国儿童文学的素材是民族的，但主题是世界的。中国儿童文学注重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能够完善世界儿童文学的整体图景，并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时代课题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以黑鹤创作的《鄂温克的驼鹿》为例，该作品立足于生态教育背景，取材自鄂温克族人物的真实经历，讲述了老猎人格利什克抚养驼鹿小犴，并在临终前毅然将其放归森林的故事。与西方许多儿童文学作品中激情澎湃的情感特质不同，《鄂温克的驼鹿》更像一部朴实而厚重的纪录片，其情感内敛、克制，却意味深长。国际书评网站 Goodreads 上的一则评论写道：“在我看过的所有儿童绘本中，《鄂温克的驼鹿》是最宏伟、最巧妙、最细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本。我认为孩子们会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独特且触及人与动物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¹ 2024 年 10 月，*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期刊主编罗克珊·哈德（Roxanne Harde）在中国海洋大学讲学时也特

1 本书引用的 Goodreads 与 Amazon 平台的读者评论，均源自相关书籍页面。鉴于评论者多以匿名或网络昵称发表言论，无法逐一列入参考文献，特此统一说明。

别提到《鄂温克的驼鹿》。她认为，该书最具启发性的一点在于，它传递了人类对动物的爱是无条件的、无需回报的。总之，中国儿童文学扎根于中国土地，具有独特的素材和思想资源。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不仅能丰富世界儿童文学图景，还能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提供新的思路与启示，从而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国家主席习近平（2021）指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晰一个基本问题，那便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实际上，回答“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应有之义。而中国儿童文学的翻译，能够在这一思考中扮演重要角色，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这些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儿童文学翻译传播的赤子之心，折射出人类最初的良知与纯真，能够帮助我们追溯“我们从哪里来”；儿童文学翻译具有实践性与社会性，回应生态危机等全球性课题，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现在在哪里”；而儿童文学翻译通过建立不同民族之间的情感纽带、编织人类共同的未来向往，则能够启发我们理解“将到哪里去”。一言以蔽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发挥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作用至关重要，其意义之大，不可小觑。

1.4 本章小结

综上所述，中国儿童文学外译在传播中国文化、建构良好国家形象、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且深远的价值。中国儿童文学外译能够推动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源于其根植于民

间文学的文化基因、重视故事讲述的叙事形式，以及兼顾成人与儿童的双重读者属性；能够助力国家形象的海外建构，源于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采用儿童和意象叙事及具有多模态特性，与国家形象的建构理念、内容及手段高度契合；能够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源于其在唤醒人类赤子之心、塑造儿童情感纽带、应对人类共同课题方面的显著优势。中国儿童文学外译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探索并不断推进。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儿童文学外译虽由中国主导，但其价值绝非单向传播。作为一项双向互益的文化活动，它不仅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国家形象的塑造，也对目标语国家的儿童成长、国际童书市场的丰富，以及国际儿童文学研究的进步具有积极意义。首先，从国际儿童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国际学者对东方儿童文学，特别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兴趣和需求日益增长。奥沙利文（O'Sullivan 2005：10）早在 21 世纪初便指出，国际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很少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边界”，并建议学者拓展研究视角。随后，斯蒂芬斯（Stephens 2013：6）呼吁：“西方学者需要更好地理解东方风格，这对理解主体性有着重要意义。”2023 年，国际顶级儿童文学研究期刊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发布特别征稿启事，主题为“儿童文学研究的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鼓励研究非英语国家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作为东方儿童文学的典型代表，其外译可以为国际研究提供新材料、新资源，完善研究视角与内容，从而促进国际儿童文学研究的多样化发展。其次，从国际童书市场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对多样化儿童文学作品的需求同样日益迫切。“英国和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和图书馆员一再指出，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尤为匮乏，尤其是来自除欧洲和日本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儿童文学作品。”（Chen & Wang 2021：

15) 为回应这一需求, 2016 年, 英国汉学家汪海岚 (Helen Wang)、瑞典汉学家陈安娜 (Anna Gustafsson Chen) 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寇岑儿童图书馆馆员陈敏捷共同创办了“华语童书” (Chinese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英文博客, 为英语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童书的平台。一言以蔽之, 中国儿童文学外译是一项双向互利的文化交流行为。它既为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传递中国理念服务, 也通过积极回应国际读者的需求, 为世界儿童文学的繁荣作出贡献。

总而言之, 无论是对我国的文化发展, 还是对世界儿童文学的进步, 中国儿童文学外译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然而, 要使其充分发挥应有的价值, 还需要系统地把握中国儿童文学外译整体的历史进程与全球格局。在接下来的章节中, 我们将对其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同时绘制其国际传播的空间图景, 以期从历史经验与全球视野中汲取智慧, 为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